

中华文明体视域下的汉藏文化传播交融研究

颜维康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 在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文成公主与吐蕃松赞干布的政治联姻,开启了唐朝与西藏之间数千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通过文化交流与互动,使汉藏之间文化有效地形成了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模式。而在相互融合的发展模式背景下,不仅为后世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承与融合中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经验,也为“多元通和”的形成留下了积极的意义与典范,同时也为形成民族共同体打下坚实良好的开端。

关键词: 共同体;多元通和;民族关系;和谐共生

“多元通和”这个概念是有牟钟鉴先生提出来的。牟先生认为“中国宗教史源远流长,多元起源,多样性互动,在发展中不断整合成中轴信仰,又保持对各种信仰的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形成多元通和生态模式”。^[1]多元文化主义形成的先决条件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而解决复杂且多样性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关键是和平交流,而和平交流的则需要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进行沟通,从而在解决民族文化融合时避免复杂化和主观化。在纵观中国历史上,汉族、藏族之间的宗教和文化交流经历可以概括为“多元通和”。在文化传播方面,两个民族都将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视为信仰的中心轴,形成了一种多维的传播方式。几种思想在和谐共存的发展模式下,枝叶繁茂,创造出了属于西藏地区特有文化。此外,它还还为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形成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虽然汉人和藏人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生活背景,但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在随着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相互融合,碰撞后形成了感情相通,和谐相处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而这种良好的开端,不仅为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路径提出和形成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各民族文化中多元通和的生态模式路径形成了重要链接枢纽。

一、汉、藏多层次宗教文化交流——唐、宋两代

自唐代吐蕃王朝不仅从文化、军事、政治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使吐蕃王朝在短时间内的迅速崛起后,便开始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政治联姻。而随着文成公主的到来,汉藏之间不仅从宗教文化、军事、政治文化都有了进一步的融合和交流,并形成了良好的循环模式,而这种开端不仅为后世的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和融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载入历史史册的开端。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在唐中后期,随着两国边境的战乱与冲突摩擦不断,从而也形成了战

战和和的局面。但在“公元882年,唐蕃双方举行“长庆会盟”,在长安和拉萨立碑,现保存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刻有‘社稷如一’”。^[2]从上述来看,从石碑中刻有的“社稷如一”这四个字来看,双方都为平定战乱和冲突,采取了有效的外交措施,来为修复两国紧张而复杂的关系。随后双方各派使臣进行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的交流,从而让文化交流有了更深一步的交流融合。

虽然是政治的联姻,但是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不仅促进了汉藏之间多层面的文化交流,并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文学、医学、农学等经典书籍,诸多的经典文献与书籍不仅在历史文献上均有记载,更多的是为文化融合的传播路径提供了良好的开端。由于这种良好的开端为后来金城公主入藏并向大唐请求诸多经典书籍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从而使一些儒家经典和古典文献逐渐被译成藏文,并在西藏传播,有效地促进了汉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其次,文成公主进入西藏时,带来了大量的佛经和佛像的同时并建立了小昭寺,让小昭寺成为传播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从而一场“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在汉藏之间拉开帷幕。在官方层面交流的同时,也在民间、寺院、日常生活等多方面上也得到极大的扩大和发展。但后来由于吐蕃的军事更为强大并占领了河西地区,使河西地区成为汉藏文化、经济与政治交融的中心。这也使中原许多求教的汉族学者和僧侣来到以文化、经济与政治为中心的河西地区,与吐蕃僧侣进行文化交流融合。人们聚集在一起,翻译经典,教授方法,交流经验,撰写书籍和理论。这种交流融合不仅是文化融合,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藏族宗教文化的瑰宝。

宋代以来,以西北汉族与藏族混合生活与居住的地区,虽然文化、经济、政治的不同,但是共同生活的环

境都经历了三个政权的统辖与管理，分别为藏族的六谷部政权，青唐政权与西夏政权。随着管辖的政权不同，但使自由经济贸易、互通互市、军民屯田等多方面的交流融合，都从生活、经济和政治等多层面上促进了汉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儒道佛层面得到了极大地融合扩展。从而自宋以来，汉藏民间文化交流的显著特征不仅是生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而是体现在地域版图的扩伸。“党项首领李继迁所管辖的河西、陇右地区，依然是汉、藏、回鹘、党项等多民族杂居相处之地，而李继迁‘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3]可见地区的逐步扩张促进了汉族与藏族之间生活、经济和宗教文化的融合，为往后元、明、清等朝代开启了历史多元化的良好开端。

综上所述，从唐朝到宋朝，汉族和藏族都注重宗教文化交流，从政府到人民，从世俗文化到宗教文化。汉地和西藏的宗教文化形成了各方面互利的局面。使各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汇聚在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河流中渊源流淌。

二、汉族、藏族宗教文化交流——元代

元朝在历史上是个神秘而活跃的时代，曾一度把中国的国境扩张到了北海，鄂毕河一带。由于元朝版图的扩张，宗教文化也随着版图的扩张和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冲突中融合并进行传播。汉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在元朝也扩大了。元朝藏传佛教僧侣在汉族地区著书、传法、传训、建寺、建塔、造像、译经、行佛教等行为均被“合法化”。虽然元太祖铁木真、元睿宗拖累、元太宗窝阔台等历代君主都对佛教礼拜有加，但是在元朝刚建立初期对于各个宗教文化政策出于包容平和的态度，没有形成压迫任何一方的宗教文化的局面，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民族信仰教派在国境内和平共处。而成吉思汗与海云禅师和丘处机道长讨教过佛教与道教禅理，还下令元朝后代君主不论在任何管辖下都要给与宗教一视同仁的生存环境和以礼相待的待遇。虽佛教和道教在元代后世统治者下谁为国教产生了分歧，但由于佛教和道教的起源、地位等不同使分歧越来越难以协调，促使元代统治者为了解决分歧，从而形成了以辩论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虽元代佛教与道教有过四次辩论，但都以道教的失败告终。“据《佛祖历代通载》说：昔在宪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书曰《老君化胡成佛经》及八十一化图，镂板传布其言，鄙陋诞妄，意在轻蔑释门而自重其教，属宾大师喇嘛总统、少林长老福裕，以其事奏闻。时上居潜邸。宪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诣上所辨析。二家自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4]

可见当时佛教的传播力比道教更加具有影响力。而元朝灭亡后，汉朝和西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没有中断。虽然中间时有发生战争，但宗教和文化交流仍然存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汉族和藏族在以往各朝代中，虽然元王朝统治者后期以佛教为国教，但是儒家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在汉族和藏族地区被广泛引用，使儒家文化结合藏族文化同时更加形成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已成为汉族和藏族的精神纽带。

三、汉族、藏族宗教文化交流——明、清、民国时期

根据《明史》卷331《西域三》的记载，明朝君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册封了西藏的多位高僧，并赏赐了大量的奇珍异宝。可见明朝政府更加注重汉藏两族的关系，这也为汉藏文化交流形成了良好的铺垫。为清朝和西藏地方政府文化融合形成了有利的开端。

而在清朝进入中原，全国统一后，儒家文化和道德伦理得到了更大的弘扬。在藏汉关系方面，清朝政府采取了怀柔政策使藏传佛教寺庙在汉地得到了广泛的建立。随着藏传佛教传入汉地，它被汉地民众所接受。清朝政府和西藏不仅建立了友谊，而且促进了藏传佛教文化在汉族地区的传播和交融。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在汉藏交界地区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在西藏地区建立了书院，将儒家文化引入西藏地区。这也为清朝和西藏这两个地方的文化交融和交流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体系，让两个更加自然地吸取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所带来的的文化营养，让其在往后的发展更加的自由化和和平化，而不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进行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融合和交流，来实现大元文化交流。

中华民国时期，国家政府在西藏地区建立了学校，开展了教育项目，加快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在西藏地区的传播，同时也促进了藏区人民对汉地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了解。“1924年，在释大勇、胡子笏居士等的鼓励筹划下，组织留藏学法团，公推大勇为团长，前往康藏学法。”^[5]可见国民政府对汉藏两地文化采取互通学习。互通学习的方式不但促进汉藏两地僧人的“距离”，也同时促进了汉藏两地僧人的文化学习和交融。也为以后汉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以后西藏地区汉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起到了跳板式的作用。民国政府的政策，也为汉地后来崇拜藏传佛教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明清到中华民国，汉藏之间的宗教文化、经济、政治交流在某些领域以及在学者和社会阶层之间频繁发生。通过不断的合作和频繁的书写和歌颂，不仅出版了满族、汉族和蒙古族的藏文经典，而且促进了儒家教育，

传播了各民族的文化，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中自然地融入了以儒家、道家和佛教为主导的中国民族文化。除西藏以外各族也在不同程度上的文化交融中，深受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不仅充满了自己民族色彩和民族特点外，也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体现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美丽”，让属于自己的那份美丽在原有的“外衣”下来体现出交融后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丰硕成果。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文化交流——1951—2021

随着1951年的5月23日签订《十七条协议》后，西藏地区进入了和平解放时代。而西藏和平解放不仅是对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而且对巩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西藏和平解放后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入手，国家制定了多条从实际出发的惠民政策。这也为汉藏文化交流融合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不在以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为中心，而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由、民主的新时代为中心。通过民主改革让广大农奴去掉了“三把刀”与“三条路”。迎来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新时代。新时代的到来不再是“黑暗”而是“光明”的体现，这也为民族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相互融合带了“光明”，而不是僧侣和贵族专政的“黑暗”。在文化和教育方面，随着解放军的入藏，带来了和平。汉藏文化方面的交融传播也随着解放军带来的民主和自由的“文化”而打破了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主义“文化”。让更多的农奴加入到这场“文化”传播中，让这种文化在旧西藏广泛传播和交融。这也是从旧西藏到新西藏这场“文化战役”中体现出广大农奴渴望民主自由的强烈愿望和中国共产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决心。

70年来，西藏从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汉藏文化、经济等方面也在

交流和融合中应用到新时代的各个方面，这也体现出汉藏两族文化在和谐共生。70年来，西藏不仅从生活还是各项事业都得到有效的进步和发展，和平解放时西藏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的心愿得到实现，这一切是沿着西藏和平解放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必然结果。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将更加团结继续沿着这条光明大道勇往直前，走向更加和谐共生的康庄大道。

五、总结

沟通和沟通可以加深沟通，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可以创造新的文化。和谐共处，使原始文化在冲突和创新中继续存在之外创造新文化。根据汉藏宗教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藏族宗教文化，同时也是融合了宗教、政治、经济和其它方面并有效吸收和融合了汉文化、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等观念的同时，将原有的宗教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和进步，去除原有的糟粕而留下适合现代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文化。也就是说，在两个民族之间复杂的文化符号体系中，中华民族这个大的文化体系符号中除了表达文化和宗教观念外，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具有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征，从而更好地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 [1]牟钟鉴.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N].人民日报, 2013.(6).
- [2]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 41.
- [3](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1099—1100.
- [4]郭立暄著.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图版编(通论)[M].上海:中西书局, 2015: 78.
- [5]顾净缘著,顾龙珠校,释大愿主编.顾净缘著述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4: 622.